

12.18



第四辑

罗定文史资料

罗定县政协文史组编

一九八四年三月



抗日战争期间蔡廷锴将军在罗定

区 映 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时，蔡廷锴将军正以休养为名，在菲律宾与当地华侨联络，促进祖国抗日救亡运动。他得知事变发生，乃于七月二十日离菲返国，二十二日抵香港。八月四日，蒋介石来电邀请赴南京，十三日抵南京。九月一日被任命为大本营特任参议官。十月十九日在南京因车祸左足膝盖骨被撞碎，往汉口医治无效，乃于十一月五日离汉口到香港医治。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足伤基本痊愈离港，返罗定休养。

六月二十一日抵县城，受到各界人民热烈欢迎，二十二日返罗镜。二十三日到洸水中学巡视，并对全校师生讲话，要求师生加强国家民族观念，树立为国家民族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指出在国难期间，学校应对学生进行战时教育，加紧军事训练，对民众要加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民众爱国精神，一致起来抗击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由于蔡将军在讲话中提出学校要进行战时教育，洸水中学遂于这年十一月开始增设战时教育课，每周两个下午（一九三九年改为每周二节课）。聘请思想进步的人为教员，讲授抗日救亡的道理，以《大众哲学》、《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书作教本。这对提高该校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起到很大

作用，地下党员龙世雄同志，当时曾以战时工作队成员的身份参与其事。

七月一日到罗定城参加全县各界欢迎大会，蔡将军在会上讲话时，特别提到罗定、郁南两县争界事，他说：“罗郁两县因争塔脚弹丸之地，竟打官司十多年，用去公款数万元，且几乎发生械斗，……请大家想想，这个对两县民众无关痛痒的县界，有无争执的价值？我热诚希望，这事无论谁是谁非，都应该不了了之，及早妥为善后，始能造福桑梓。有些人以事关‘荣誉’为词，煽动争界。其实，这是最愚蠢、最不荣誉之事。除了害民伤财之外，还显示了邑人知识低下，眼光狭小。现在国家民族已到了极危险的关头，请大家打开我国地图看看，已经变色到怎样的程度！从前的琉球、台湾，最近的东北四省、华北、长江流域，都被日寇侵占蹂躏！我们如果仍不关心国家民族的斗争，捐弃私嫌，团结对敌，那就只有坐待敌人的宰割奴役。罗郁两县同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两县人民同是黄帝的子孙。政府划分县界，全是为了行政上的便利。地界不清，只是行政上权限未能分清，对民众福利实无关系。希望双方今后不要再提争界之事，除掉私见，听凭政府处置。大家有钱出钱，捐献给国家，有力出力，上前线杀敌。这样把私争变为公斗，把日寇赶出我国领土，才是最光荣的事。以上是我由衷之言，请大家考虑。”其后，他和人闲谈时，曾多次提到罗郁争界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争界对两县人民有百害无一利，只对两种人有利：一种是受理争界诉讼的上级官吏，他们可以收受双方的贿赂；一种是两县的一些劣绅，他们可以滥用公款，

借饱私囊。罗郁争界事，经他明确表态反对后，就真的不了了之。

这年的七、八、九三个月，蔡将军都是在故乡罗镜龙岩村居住。对乡中情况了解渐多，他常和乡人谈他离去十多年后重回故乡的感觉。他说，这十多年，罗定在教育和交通方面有所发展。过去唯一的一所中学——罗定中学只办初中，现已办了高中，成为完全中学，还创办了县立乡村师范和泮水中学，全县小学也增至三百多所；交通方面，过去没有行汽车的公路，现在有从县城至南江口、罗镜、泗纶、太平、围底等几条公路。但生产方面则毫无起色，许多农村都是十年九旱。蚕桑、茶叶、桂皮都比过去减产，隔别十多年的邻里故旧，生活依然贫困，终日辛苦，竟至两餐稀粥，亦不能维持。这不特本乡如此，各地劳苦大众，莫不如是。这实由政治不上轨道所致。经过二十多年的所谓革命，竟得到这样的结果，实最为痛心。他在乡里大力宣传破除迷信，改革旧习俗，提出尤以改革丧事陋习为重要。

这年十月上旬，日寇在惠阳澳头登陆，向广州进犯。十月十二日接余汉谋、吴铁城等来电邀请赴广州共商御敌大计。十六日离罗定。十八日经顺德陈村时，遇空袭，伤右肋。而广州已入混乱状态，乃折返肇庆。广州沦陷后，十月下旬被任命为广东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指挥西江南路团队，设指挥部于新兴。十一月上半月巡视四邑两阳团队，被敌机追炸多日。十二月，辞去团队指挥职务，由新兴返罗定。

蔡将军返乡后，曾捐款扩建罗镜公园及民众教育馆。当

时我地下党以中山大学三罗同学会名义筹办《三罗日报》，派人请他为该报题写报头，他慨然答允。这为该报其后的出版发行等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九年一月初，蔡将军接军事委员会通知赴重庆。途经罗定时，适战区司令部派一参谋来督促破坏公路及桥梁，并指定要先破坏罗镜官渡头桥。当罗定县长向他报告这情况时，他指出：破路阻敌，是一种办法，但应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哪些路应破坏，哪些路可以保存，断不能毫无区别地把所有公路一概破坏。罗定的公路除通云浮、南江口两段接近前线，易为敌人利用外，其他都无立刻破坏的必要。罗定城至泗纶和罗城至罗镜两段，分别以泗纶、罗镜为终点，不与别的公路连接，更无破坏的必要。官渡头桥离罗镜不远，万一敌情紧急，确有破坏必要时，才破坏，也绝不会有所贻误。他希望地方当局能接受他的意见。后罗定县长又来报告说：“上级派来的那参谋坚决要立刻破坏，如果我不照办，恐怕会受责备。”他即明确表示：官渡头桥绝不能破坏，如果上级查究，他愿担负阻止破坏的责任。这样，才保存了这座桥梁，避免了无为损失。一月二十四日抵重庆，不久被任命为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二月十一日离重庆，十六日到广西桂林就任新职。

一九三九年三月底，蔡将军乘巡视防区之便，曾回乡数天，当时，罗定中学学生因反对反动校长曾某破坏学生救亡运动，学生提出批评，学校当局竟开除进步学生七人（其中四人是共产党员），学生罢课抗议。罗中学生得知蔡将军已返罗镜，乃派代表二人往谒，详细报告学潮情况，请求给予援助，

他对该校长的反动行为极为愤慨。他说：“对日抗战已一年多了，现在还要象几年前那样抗日有罪吗？”他表示支持学生坚持宣传抗日救亡的行动，并说明他在乡只逗留几天，而且身任军职，不便直接插手地方行政事务，但必采取适当途径给予帮助。第二天，他即去函广东省教育厅长，指出曾某处事不当，并提出对横遭开除学籍处分的学生，应作合理处置。后来学校把对七名学生开除学籍的处分改为饬令转学，校长曾某亦于这年七月被省教育厅撤职。这次斗争的胜利，主要是罗定中学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经过坚决的斗争取得的。而蔡将军对学生的同情、支持，也起到一定作用。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蔡将军被任命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四〇年九月，蔡将军辞去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职，九月底由灵山返抵罗镜故乡。在乡住了两个月，日与戚友相过从。乡中朋友问他为什么要辞去军职？他说：“我是军人，在日寇未被扫除之前，本应继续为国家民族效力疆场，但环境恶劣，处处受制肘，不要说做集团军总司令，就是让我当战区司令长官，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一不小心，还会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啊！”似有许多难言之隐。回乡后，有时连报纸也难看到，极感无聊，遂决定往桂林休养。这年十二月由乡抵桂林，不久军事委员会又任命他为特任参议官。

一九四一年一月初，蔡将军从桂林往香港。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月，曾访何香凝、宋庆龄等进步人士。三月初由香港返桂林。十月曾到湖南衡山参加军委会召开的军事会议。

一九四二年三月初，蔡将军率子女三人从桂林回乡扫墓。

三月十五日，与同族父老兄弟往马鞍山扫祖墓。扫墓完毕，曾无限感慨地对父老们说：“我离家从军到今已二十年了，未曾能在春分、清明时节回乡扫墓。现在日寇占领着我国大片土地，国难严重，却有闲暇回来扫墓，确是我这个一贯主张坚决抗日的人意料不到的。”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一·二八”时十九路军能孤军抗日，前两年他当总司令时却不能打退日寇，最后还要辞职？他说：“今非昔比，环境不同之故。我过去不怕日寇，难道现在就怕它，就要辞职不干吗？”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是极为不满的。四月初，离乡返桂林。十月底，离桂林，往游云南贵州。十二月下旬从昆明返抵桂林。

一九四三年五月，在中山大学就读的罗定籍学生十余人联名写信给他，请求他向菁莪德义两局建议，将该局公产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奖学金，发给我县在大专学校就读的学生。他立刻复信，指出两局公产收入，应主要用在资助县内教育、公益事业，过去为少数豪绅把持，滥支挥霍，贪污中饱，亟须整顿，并说已去函两局，要求他们在每年公产收入中拨出一定数额作为我县大学生的奖学金，而每年两局开会审核预算决算及推选管理人员时，应有大学生代表参加。这年七月，两局召开会议时，遂邀请大学生代表参加，会议决定了每年发给大学生奖学金的数额。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寇发动了打从东北到广州、南宁的“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日军五万人向河南进攻。国民党军队约五十万人，不战而逃，仅一个多月，河南全境沦陷。六月中，长沙陷落。七月衡阳失守后，桂林差不多已成空城，

蔡将军乃离桂林，经平乐、梧州，于八月初抵罗城。其时，西江上下游均奉命疏散，罗城有人满之患。竟有驻都城的税警某团后方派一副官带兵两名，以来罗定设营为名，在离县城数里的松茂地方勒收行水，凡罗镜、太平的船经过该处，每船勒收数千元，稍不如意，即将货物抢掠变卖。地方党政机关对船家及商人的控诉，置之不理。蔡将军获悉后，即请罗定县长查究此事。勒收行水的税警团官兵始星夜逃散。蔡将军八月下旬，离罗城返罗镜。

九月上旬，犯西江的日寇向新兴、云浮推进。新兴沦陷后，罗城紧急疏散。九月十四日，敌人先头部队已抵云浮托洞，有犯罗定之势。十五日蔡将军在罗镜召集第三区（罗镜、太平、分界）所属十个乡的乡长及士绅开会，讨论保卫家乡事宜。会议决定立刻组织武装团队。团队指挥部设于罗镜东圩梁家祠，公推蔡廷锴为总指挥。团队粮食，由地方乡仓及县粮仓借拨，副食费由十多个乡和罗镜、太平、分界三个圩负责，向广东省银行罗定分行借款三十万元。团队枪械，由各乡筹措。他先把家中所藏轻重机枪六挺、步枪八十多支全部拿出来。各乡有枪人家均愿意把枪借出。仅三天时间，各乡都组成了武装团队。团队成员特别是各级干部多数是十九路军旧部。十八日，敌人便衣队已窜扰苹塘附近。十九日早上，他通知各乡团队集合罗镜圩新街口训话，到来的武装团队近一千人。二十日，敌先头部队已入苹塘。二十二日，敌后续部队大部已抵苹塘。二十三日，他下命令：“（一）据确报，敌伪约万余人于昨二十二日已抵罗定城附近；（二）我谭指挥官启秀所部正与敌在围底素龙等处激战

中，（三）本区乡各团队为迎击敌人及策应谭部消灭该敌，区分如下：（甲）派陈次云为右翼指挥，彭启鸾副之，率领太平四乡各团队，于二十四日拂晓前占领荔枝根洞尾金山径一带阵地，并派一部占领金山径半径，严密警戒。（乙）派谭香为左翼团队指挥，张展鸾副之，率领罗镜水摆分界各乡团队，于二十四日拂晓占领官渡头一带阵地，派出一部在大汶塘严密警戒，左翼与新榕谭部联络，右翼与太平各团队联络。（丙）镜南乡团队为总预备队，直接归本参议官指挥，应占领石狮庙、白花社、古调坡、九仔窑之线，策应各方；罗镜圩商团警察归关区长指挥，不时梭巡市面。（丁）罗镜市面应紧急疏散。（戊）余在罗镜腾庐。”这天，敌人已窜犯罗定城。罗镜、太平等地由于他亲自指挥团队布防，故地方安定，秩序整然。国民党三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朱晖日、总司令邓龙光于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先后率残部经罗镜向信宜逃跑，状极狼狈。九月三十日，敌退出罗定城西窜。十月十日，他下令第三区各乡团队复员。

十月底，蔡将军参加泮水中学董事会议。他提议：（1）扩建校舍，变卖座落水摆的几十亩田地及罗镜圩的几间店铺等校产作为建筑费；（2）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开始招高中普通科新生，停招师范班，把泮中变为完全中学。他的提议获得一致通过。这年冬，泮水中学即将所有旧式校舍拆除，动工扩建新校舍。

十二月，蔡将军得知罗信边区有不肖之徒种鸦片，即函请罗定县长派军警铲除。

一九四五年一月初，蔡将军知道张炎在南路起义后，逃

至广西郁林，被当地扣留，立即致电张发奎、蒋介石，竭力营救。张炎被杀后，他很悲愤，曾对人说：“生当乱世，真是人命如草芥！”当时，三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朱晖日、广东省政府南路行署主任胡铭藻联名给信他，说共产党想以罗定为基地进行活动，并列几个所谓共产党人的名单，要他协助军政当局，对这些人予以断然处置。信中还提张炎的事。他接信后，极为愤慨。认为是对十九路军旧部的影射恐吓，用心极卑鄙毒辣，实为小人之尤。后三十五集团军的一个师长邓某，又把列有二、三十人的所谓奸党名单给他，请他协助逮捕。他明确表示，名单上开列的都是好人，不能无故逮捕。这样，反动派企图迫害罗定进步人士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李济深自一九四四年秋桂林沦陷后，即回他的家乡准备策动西南独立运动，想把两广、云南的地方势力联合起来，独立地树起抗日讨汪的旗帜。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李曾派人来与蔡将军联系。当时李济深打算依靠广西东北地区，以及广东南路的张炎，三罗的十九路军旧部等地方势力，首先搞起来。一九四五年一月，李济深从苍梧出发，准备到南路同张炎进一步策划。到达广西郁林时，蒋介石已派兵把张炎部队打散，把张炎枪毙。李济深只得经茂名信宜到罗定同蔡将军计议。二月二十日，李济深抵罗镜，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他。二十二日下午，罗镜各界在泮水中学操场开欢迎大会。李济深在会上讲话，揭露国民党统治区所谓中央直系军政人员横行霸道，鱼肉人民，只顾横征暴敛，不愿抗敌卫国的种种罪恶行径，号召人们自治自卫，坚持抗战到底。李讲话后，蔡将军也讲了话，表示拥护李济深自治自卫的主张。最后说：“我

从军几十年，从士兵当到总司令，目的是保卫国家民族，使人民安居乐业。如不符合这个目的，就是总司令我也不当；如为这目的而奋斗，当个排长也心甘情愿。”二十四日，他随李济深到罗定城与谭启秀会商。

当时，中共中央对李济深搞的西南独立运动颇重视，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派李嘉人以东江纵队代表名义到罗定同李济深、蔡廷锴会谈，了解情况，并表示东江纵队对他们的支持。在会谈中蔡将军与中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反动独裁统治的态度十分明朗。

八月十四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蔡将军准备于广州、香港恢复正常秩序后，即离乡赴广州或香港暂住，须速将年来耿耿于心的协助地方人士发展本县教育一事办理，乃于八月二十日致函德义两局，指出两局每年收入为少数人所把持，互相分肥，殊失前人捐资设局，资助青年学子之初衷，亟须从速改革，建议限期召集公正士绅及各区代表会议，讨论兴革事宜。

九月三十日，蔡将军参加德义两局召集的士绅及各区代表会议，在会上讲话，指出两局公款，过去被少数人滥支浪费，贪污中饱，殊堪痛恨。建议今后两局每年收入，除必要的管理费外，全部拨给各学校及大学生的奖学金。会议决定，两局每年收入租谷作如下分配：按原来六个区，每区每年拨办学谷三百石；拨给大学生奖学金八百石；拨给泮江医院一百五十石；拨给罗定师范和县立中学各一百石；所余则作为管理费及其他公用。会议并决定每年要把收支帐目公布。经这次会议后，两局收入为少数豪绅予取予夺之情况有所改变。

罗定县发现的战国墓

陈 大 远

在我国古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分为以使用石器为特征的原始社会，以使用青铜器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和以使用铁器为特征的封建社会。但过去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南方，特别是广东、广西等地都没有经过上述三个阶段，他们认为：广东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直延续到战国末年，它的解体和向阶级社会过渡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后。也就是说，广东在以使用石器为特征的原始社会之后，并没有出现过以青铜器为特征的奴隶制社会，是由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飞跃的。所以，广东青铜器时代的考古历来是史学界十分注意研究探讨的问题。

建国以后，广东地区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不少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墓葬，在发掘清理这些遗址和墓葬时，发现了西周、春秋、战国时的青铜器文化遗迹，特别是在西江流域中发现了不少春秋晚期与战国的人型墓葬，仅青铜器就有一百多件，从而推翻了广东历史上不存在奴隶制社会的论断，揭开了广东青铜器时代社会的真面目。其中，罗定县的青铜器时代考古占有重要地位。从一九三二年英国学者在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中发现第一件青铜器开始，长达半个多世纪，广东各地发现的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还不

到一千件。而罗定县先后两次从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就有二百多件，占了五分之一多，而且有不少是制作精美，堪称稀世珍品的器物。

罗定县在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开荒造田的时候，曾挖出不少青铜器，但由于群众缺乏这方面的历史知识，许多青铜器都当废品卖掉，许多墓葬和文化遗址遭到了破坏，十分可惜。

一九七七年，在扩建引太水利工程的南门洞工地，民工挖出了春秋、战国墓三座（下称一号墓、二号墓、三号墓），出土青铜器一百四十七件；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县文物普查队又在罗平区沙头乡横洞村背夫山发现并发掘清理了春秋战国墓一座（下称背夫山墓），出土青铜器七十多件。太平南门洞出土文物现存省博物馆，罗平背夫山出土文物现由县保管。

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可以分为西周至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西周至春秋（公元前十一世纪——公元前四百七十五年）这一时期的文物是以“夔纹硬陶”为主要特征的。战国（公元前四百七十五年——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这一时期的文物以“米字纹、水波纹、蓖点纹”最为常见。罗定所发现的青铜器时代墓葬以前一时期最为重要，墓葬形制规模之大，随葬器物之多，在广东也属少见。

西周至春秋是广东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时期。西周时，楚的势力已发展起来，对岭南地区有一定影响，楚熊渠“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郢”，虽然军队尚未进岭南，但居住在湖北、湖南、江西一带的人民，因战争而被迫离开家园，流

落岭南是极可能发生的。春秋时期，广东的文化受楚文化、吴越文化、滇、夜郎文化和华夏文化的影响，而楚文化的影响最大。楚成王即位时，天子赐詐曰：“镇尔南方夷族之乱，无侵中国。”说明楚国与越人曾发生过战争，并有“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既为楚地，故筑楚庭以朝廷”之说。而西江流域一带，其上游滇、夜郎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其交通之便利，更易传到西江地区。罗定地处偏僻，受战争影响较少，生产水平迅速提高，青铜文化发展迅速，故罗定与西江流域其他地区一样较早地出现了青铜文化的繁盛时期，构成了更为复杂和具有自己风格的青铜文化特色。

罗定所发现的春秋墓葬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号墓和背夫山墓均长四米、宽二米，挖深一点七米至二米，是目前广东发现规模最大的两座。一号墓由于遭到破坏，已弄清其随葬器物的排列规律。背夫山墓基本上以墓前后各竖两条人首柱形器为中线，每对间距约二十公分，好象是把守着前后两个墓门的门卫（其他地方发现的同一时期墓葬人首柱形器在墓的四个角，有的不足四条人首柱形器），柱形器前各放置一石块，位于中线上，作祭石用，礼器、兵器、饰物在前，工具和石器在后，陶罐在祭石后，墓中间挖一个圆形底坑（其他地方发现的同一时期墓葬都是挖方形坑）埋葬一个陶瓮。这个坑一般在死者腰部位置，称腰坑，除腰坑外，其他大件青铜器也挖底坑深埋。

从出土的春秋墓随葬物中，最能反映阶级对立的是埋葬有大量青铜器的大墓。罗定两个大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二百多

件，均有炊器、乐器、大件容器以及众多的兵器，说明这些人生前有权有势，不但占有大量财富，拥有众多的武装，出则仪仗拥簇，入则钟鸣鼎食，过着奢侈的生活，正是《淮南子》所说的“百粤之君”，但他们只是一些分散的奴隶制小国，由于地形分割，交通不便，没法联成一片，组织起强大的政治集团。可以说，罗定在春秋时期，在大平和沙湾两地已出现分别拥有众多财产、称霸一方的奴隶主新贵。

从罗定两地出土的青铜器来看，炊器主要是鼎。青铜时代的奴隶社会等级制度深严，随葬品盛行用鼎，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一至三鼎，平民和奴隶根本无资格用鼎，甚至连一件陪葬品也没有。虽然，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奴隶制度正走向没落，到处是礼崩乐坏的颓败景象，但是，在边远地区广东，那些奴隶主新贵却用青铜器显示富有和尊贵的社会地位，极力吸收标志社会等级身份的礼乐制度，甚至潜越使用。在罗定，一号墓中有鼎三件，背夫山墓中有鼎二件，除了一号墓中有一件鼎与湖南楚墓形制相似，其余四件鼎是四件外撇足鼎，底平，有较厚的烟炱痕迹，乃实用之物，这种鼎中原地区甚少见，仅见于南方，与长沙战国墓Ⅰ式鼎相似，广东的春秋墓中常见。

酒器有盃和缶，均见于一号墓，其中铜盃铸造精美，纹饰粗巧细碎，布局严紧，钮有链条与把相连，咀为兽头形，张口竖耳，与四会所出土的形制花纹相同，铜缶与传世的“栾书缶”相同。

容器仅洗器鉴一种，一号墓与背夫山墓均有二件，器形较大，背夫山墓的鉴挖底深埋墓中。鉴是古代盛水作镜子

用，“借鉴”典出于此。鉴在江南一带盛行，罗定所出土的铜鉴是广东所仅见，与安徽寿县蔡侯墓，江西所出土的形制相似，具有吴越文化特点。

一号墓出土甬钟六件，这些钟不是原配，而是凑合起来的编钟，编钟一般属单数，该墓所出的是双数。一号墓所出的钲和背夫山墓所出的铎都是军乐器，是作指挥行军布阵之用，均是春秋之物。早期多用钲，中晚期多用铎。

人首柱形在一号墓和背夫山墓中各出四件，一般认为，这种器物是象征奴隶主权力的身份的仪仗，用以祭祀、出巡、征战显示权威，一组四件，埋于墓的四个角。但在广东各地出土的人首柱形器，仅在大墓中发现，有些还不足四件。人首柱形器顶端铸人首，下接空心或实心的长方形立柱，合范铸造，下有插销，象个十字架。人首深目高鼻，黥首贯耳。乃当日受“黥首贯耳”酷刑的“断发文身”的越人奴隶形象，背夫山墓人首柱形器的位置不在四个角，而是立于“门”的两侧，象个守门的门卫，奴隶的形象更为明显。这种葬式为学者们研究人首柱形器提供了新的材料。人首柱形器是青铜时代广东地区独有之物，地方色彩最为鲜明。

出土的兵器有剑、矛、戈、斧、簇、钺、叉等。

一号墓出土剑三件，二号墓出土剑二件，三号墓出土剑一件，背夫山墓出土剑三件，分为二式，Ⅰ式为短剑，后有椭圆玉首，玉已变为石灰质；Ⅱ式为长剑，剑格呈菱形，茎为椭圆形，上有箍，首为喇叭形。矛的出土较多，一号墓出土十三件，分为七式，二号墓出土一件。背夫山墓出土戈二件，较为完整。戈在中原地区常见，是兵车上将官使用的兵

器，在战争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故战争曰“大动干戈”。南方多山，不宜使用战车，戈甚少见，而出土较为完整的，广东仅得四件。斧和钺都是实用器，大的饰勾连云雷纹，下垂三角形垂叶纹，一号墓出土钺四十三件，均有打磨和使用的痕迹，显然不是奴隶主个人使用的工具，而是用来役使奴隶的武器。背夫山墓出土钺三件，均较精美，斧、钺与滇、夜郎的器物相近，斧、钺广泛使用。南方作战，多用矛、镞而少用戈。矛既有楚的特色，又有广东自己的独有风格，构成了广东青铜文化具有不同于其它地区青铜文化的特色。背夫山出土的叉一件，是中原文物，广东所仅见。

战国时期，由于中原文化，尤其是楚国文化对广东影响更为深入，所以这时期广东青铜文化得到迅速发展。战国中期，吴起南平百越，广东地区处于楚国的势力范围内，军事的渗透，战争的影响，文化的交流，加速了广东地区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使大量的青铜器工具出现。一号墓出土矛镞二件，二号墓出土镞刀一件，背夫山墓出土镞一件，锤二件，凿一件，镞刀三件，镰刀一件。说明罗定地区比广东其他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更快，更早进入青铜器繁盛时期，而且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出土的青铜器矛与镞刀的符号标志不同，在这些器物上有“王”字和“区”字，春秋战国时代，广东尚未见文字，可以认为这是“古代当地的一种族徽”或青铜器铸造者的族徽。

在广东春秋墓葬中，随葬物都有一个陶瓮、一个陶罐或陶缶。一号墓仅见一件陶缶，饰勾连云雷纹和方格纹，为广